



2012卷

浙江文坛

浙江省作家协会 编



2012卷

浙江文坛

浙江省作家协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文坛(2012 卷) / 浙江省作家协会编.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39-3838-3

I. ①浙… II. ①浙…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1898 号

责任编辑 项 宁 沈利娜

装帧设计 水 墨

责任校对 陈 玲

浙江文坛(2012 卷)

浙江省作家协会 编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金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 272 千字

印张 13.125

插页 2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838-3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浙江文坛

2012卷

浙江省作家协会 编

主 编 曹启文

副主编 苏沧桑

目录

001 | 2012 年浙江长篇小说述评

郑翔

031 | 2012 年浙江中篇小说述评

陈建新 张雪燕

059 | 2012 年浙江短篇小说述评

卢敦基 周静

079 | 2012 年浙江诗歌述评

柯平

121 | 2012 年浙江散文述评

周维强

147 | 2012 年浙江杂文述评

朱国良

159 | 2012 年浙江报告文学述评

朱首献 秦莹莹

188 | 2012 年浙江小小说(兼故事)述评

谢志强

209 | 2012 年浙江戏剧文学述评

严 迟

231 | 2012 年浙江影视文学述评

张子帆

247 | 2012 年浙江儿童文学述评

孙建江

276 | 2012 年浙江外国文学述评

张逸旻 天 竹

305 | 2012 年浙江文学评论综述

刘 忠

334 | 2012 年《江南》述评

金学种

355 | 2012 年浙江类型文学述评

夏 烈

373 | 2012 年浙江文坛大事记

省作协创研部整理

2012 年浙江长篇小说述评

郑 翔

与 2011 年的丰收相比,2012 年浙江的长篇小说创作,从总体成绩来看,略有不如意,佳作不多。目前收集到的作品有陈河的《红白黑》、王志强的《银雀地》、沙民的《戏如人生》、黄梅宝的《水色》、朱平兆的《一佳灯火》、谢方儿的《1983 年的成长》、王英的《我与父亲的战争》、倪树根的《富春山居图》、叶宗轼“卸了妆的历史”系列之《风吹草长》(上、下)、黄立轩的《沧桑正道》、周建新的《村歌嘹亮》、郭西村的《远去的年代》、陈瑞欢和陈培策合著的《古村奇事》、陈章寿的《文大山》、周新华的《丁氏大村》等 15 部,另有符利群的《万物生长》系 2011 年的作品。

陈河是对文学抱敬畏之心的,他的《红白黑》是 2012 年浙江长篇小说中分量较重的一部,但这部小说实际上是 2007 年的作品,发表于该年《收获》长篇专号的秋冬卷,2012 年出了单行本。小说写的是在国内做大货车司机的谢青,因分居多年的妻子杨虹在巴黎的意外死亡,来到巴黎办理手续,在追查杨虹死因的过

程中,结识了大蛇头秋媚,秋媚看中他的能力,让他帮忙运送偷渡客,在利益和异乡生活的吸引下,他也成为一名蛇头。但秋媚却因一次运送偷渡客的事故,引起国际关注而被迫逃亡突尼斯,她将生意全部交付谢青,从而使他成为巴黎华侨中的富豪。多年后谢青衣锦还乡,涉足当时正在疯长的房地产业,登上了荣华富贵的顶峰,然而,随着建设局局长的外逃,谢青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安稳地待在国内。而秋媚也因思乡回国而被捕判刑。

《红白黑》发表时的原名叫“致命的远行”。由于陈河长期生活在国外,有着丰富的远行经历和人生感悟,所以“远行”很自然地成为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母题。在这部小说中,主要写了三个人的远行,那就是杨虹、谢青和黄秋媚。虽然三个人远行的具体原因和到达方式很不一样,到达后的生存方式也很不相同,但他们的远行和停留都是自己的选择,而远行的原因都是对自己在国内的生活状态不满意。作为记者,杨虹生活无忧,但她对这种重复的工作和受拘束的人生状态很不满意,所以在高干姜小军的安排下去了巴黎。在巴黎,她无须工作,但这种无所事事的豪华生活让她深感空虚与无聊,于是她宁愿选择提篮子到海边浴场做小贩。谢青是意外到了巴黎之后,才产生了对自己原先生活的不满意,最终选择了国外的生活。秋媚历经艰辛的远行之路,则更是对远方生活的主动追求。总之,远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对幸福的追求”,是冒险,又是对一种自由、恣肆的人生状态的追求。但正如作者所说,和其他大量远行的中国人一样,“他们一旦开始了远行,就无法回去。这些人即使后来回到国内,但心还是回不去了,因为人已经被改变”。接近

百年之后,小说中的远行者又遭遇到了类似于鲁迅的“南来我不过是游子,北国又不是我的故乡”的失根的尴尬状态,只是南国与北国,此时已变成了国内与国外。青年评论家何平在研究现代“还乡”母题时指出:“现代‘还乡’中所蕴涵的选择性危机是每个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后现代化民族或国家所必然遭逢的。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和精神内容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性’话题的一部分。”《红白黑》中对远行者的人生、命运的描述,所揭示的正是这样一个普遍性的生命困惑。

当然,共性的背后还有个性,集体的命运之中还有各不相同的个体的命运,这些又构成了这部小说的诸多子母题和子主题。比如小说对杨虹和姜小军这些“红二代”的人生和命运的描述。杨虹和姜小军都是出身于高干家庭的“红二代”,这使他们拥有普通人所无法具备的得天独厚的社会资源,但同时也使他们更加无法掌握作为个体的自身命运。父亲自杀之后,杨虹只能嫁给一度给予自己温暖的平民司机谢青,但家庭背景的巨大差距,使他们之间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情;骨子里的清纯、高傲,也使她无法忍受记者生活的单调、重复和基层官僚的庸俗,她的远行有着符合其出身的内在逻辑。姜小军的父母和岳父母都在中央身居高位,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国内的事没有我们搞不定的”,但正因如此,他比普通人更加身不由己,上一代的接力棒不容他不接,所以他和杨虹的爱情注定是个悲剧,因为他没有自主的爱的权力。在得知杨虹的死讯之后,他甚至都不能流露出半点伤感,即便此时他已贵为部长。如果在姜小军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陈河对权力与幸福的关系的思考,那么在秋媚的身上,我们看到

的是陈河对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的思考。秋媚几经磨难,终于富甲一方,却终日奔波,流离失所,当她回国被抓进监狱之后,她反而获得了一种安定,无牵无挂,能吃能睡。谢青同样获得了自己以前想也不敢想的财富,却也成为无根的浮萍,他是否获得了幸福?当然,小说中所展示的个体命运,还远不止这些,但这些子母题和子主题都一起构成了这部小说内涵的层次性和丰富性。

当然,促人思考不一定等于作者必须对各种现象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价值判断必然会简化生命自身的丰腴性和复杂性。陈河或许更想以自己独特的经历,给人们展示一些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和生命情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因为自己就是移民的一分子,所以能写出一些和内地作家视觉不同的作品,给读者带来一些新鲜的经验。”所以,在陈河的笔下,不管是红道、白道,还是黑道,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正常人;他展示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心理状态,但不做主观的价值判断。对所有的这些生命存在,陈河都取一种包容的态度。这种包容,既蕴涵着作者对个体人生选择的理解与怜悯,也体现了一种更高、更阔大的文化视野。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做价值评判的包容态度,实际上也更体现出文学的蕴藉特性。海外文学评论家陈瑞琳认为,“从东方走到西方,陈河看待历史和生活的视角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的非功利写作心态使得他拥有了纯客观的冷静与理性……海外生命的移植与沉淀激活了陈河潜藏在灵魂深处的激情和欲望,正如同诸多的海外作家,生命的重新嫁接让他们蓦然焕发出饱满的异样光彩……远离带来的是审美的

距离,漫游呈现的是自由状态的洗礼,海外华文文学近二十年来所形成的精神特质在陈河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呈现。”这是确评。

最后要附带说一下这部小说的情节设置。小说开篇就写到杨虹意外死于巴黎,其丈夫谢青出国处理后事,并对杨虹的死因展开调查,悬念十足,把读者的思维导向阴谋论。但篇末交代,杨虹死于酒后驾车。对于这样的写法,陈河坦言,创作要迎合市场,尽量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我知道国内读者都喜欢看故事,过于文艺、深沉的东西可能不受欢迎,所以一开始就用策略把读者先拉住再说。但写作不能牺牲内核,这是作者的责任。这本书主要表现杨虹的理想和悲剧性,如果里面写到太多阴谋,对杨虹的表达没有好处。”这正体现了陈河自己所说的,“对文学抱有敬畏之心”。可以看出,陈河显然是一个对文学有清醒自觉的作家,而这也正是他重拾文学之后,能够不断有所突破的重要原因。

王志强的《银雀地》是其继《银界》、《银色家族》、《银行家》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金融题材小说。小说以一家钱庄的盛衰史,折射出中国钱庄业的发展脉络,并以此反映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状况;同时,还通过“隆昌”和“恒记”的斗法,揭示出中国传统的经营理念和现代市场规则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与人性、道义之间的无解搏杀。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北伐战争前夕到抗战初期,小说主线写主人公“我”(黎高糖),来到省城的隆昌钱庄当学徒,与钱庄大股东柳家的三少爷成为争夺钱庄阿大的对手,结果获胜并迎娶二小姐而入赘柳家,但最后,在三少爷的报复和时局的变迁中,“隆昌”走向衰败,柳家家破人亡。

小说的主要矛盾围绕着“我”和三少爷之间展开，两个人之间的争斗，可以说是中国钱庄风雨飘摇的全部历史的一个缩影，某种程度上让人联想起茅盾的《子夜》。“我”是一个来自宁静的黎村的单纯少年，因恪守信义、稳重而在争做隆昌钱庄阿大的斗争中获胜。“我”不但代表了钱庄讲究“信用”的经营宗旨，也直接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三少爷聪明好胜，但也好妒记仇，因为嫉恨父亲让外人当钱庄阿大，他竟放火烧自己的家，并转投竞争对手“恒记”的门下，进而借助雄厚的洋行资本要置“隆昌”和自己的亲人于死地，他是站在中国传统道义对立面的现代资本的代表。

但在具体情节发展中，王志强并未按照道德标准简单地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而是如有人所指出的，是继续着他之前小说对资本与人性之间深入而复杂的解剖工作。虽然，外资洋行与本土钱庄的经营模式各有利弊：洋行投身贸易，风险高而获利丰，钱庄依托实业，虽然获利薄，却将基础构筑在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完善与长期发展上，但是，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历史年代，钱庄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已被摧毁，资金周转更快的洋行显然更加符合市场的运转法则。加上在国难来临之际，“隆昌”所面对的实际上已不单是生意，而是民族的气节，所以衰败是必然的结局。“于是，《银雀地》所书写的钱庄历史，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悖论。黎高糖与柳贵人，以不同的人生取向，分立在历史道路的两端，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隆昌”的衰败是历史的必然，小说的结局是对历史的尊重，但这并不影响这两条不同的价值标准之间持续的、无休止的博弈，也

不影响小说对“银雀”所代表的价值理性的理想主义情怀。小说以黎村的大樟树为雷所劈、乡人崇拜的银雀被毁开篇,以黎高糖回归黎村、大樟树上飞满银雀收尾,显然就是对这种理想主义情怀的表达,这种表达应该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向的。

上文中指出,《红白黑》的情节设计有迎合中国读者的成分,但出于对文学的敬畏,陈河做到了适可而止。其实,在 2012 年浙江的长篇小说中,有这种迎合倾向的小说不在少数,《银雀地》也是其中之一。虽然这部小说有着类似于《子夜》的严肃主题,但它又较多地融入了武侠、爱情、江湖、家族争斗等通俗小说元素,在增强了小说的情节性与娱乐性的同时,也削弱了小说的文学纯度。这种迎合是否具有合理性?或者说,多大程度上的迎合才是合理的?这是一个作家和当下文坛都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沙民的《戏如人生》和黄梅宝的《水色》是两部具有一定可比性的作品,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都有一个因饱受时代创伤而性情极其乖张的女主人公形象,但两部小说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效果却颇不同,有必要放到一起略做比较。就《戏如人生》,我首先想谈的是它的情节结构。近些年国内的长篇小说,从情节结构上来看,多以散漫、琐碎的所谓“生活流”、“原生态”为主,在这方面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不多,所以《戏如人生》的结构值得一说。小说的题目叫“戏如人生”,突出的是“戏”和“人生”的关系,一方面要表现人生遭际强烈的戏剧性,另一方面要表现一场戏如人生般难以捉摸的遭遇,从而在这“戏”与“人生”的相互印证中,表达作者“对人生道路和价值的思考,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忧虑”。

具体到作品里,小说的七章全都是紧扣着一场戏来展开情节构架的。“送戏 抢戏”讲的是故事的缘起,农村出身而学艺成名的丫丫,被安排在春节期间回老家送戏,前山与后山两个本来同宗的村子准备抢戏。“生戏 死戏”、“民戏 官戏”、“爱戏 恨戏”分别回顾了丫丫少时所受的身体和精神的磨难,她由民间剧团到省剧团的经历,和进入省剧团后因社会大环境的冲击而产生的心理变化;“热戏 冷戏”、“武戏 文戏”和“散戏 聚戏”写的是丫丫的剧团回到老家所引发的一系列戏剧性冲突。通过一个“戏”字,小说不仅把笔触从现实伸向了历史,也把笔触从农村(基层)伸向了城市(高层),形成了以一点为中心的时空交叉结构。于是这场戏就成为“一场事关女明星声誉的戏,一场事关亲兄妹生死的戏,一场事关两村恩怨的戏,一场事关国家干部前程的戏,一场上不了台的戏,一场下不了台的戏”。总之,这个“戏”就像一个黑洞,把周围的时空都有力地吸附进来,从而使小说的结构集中、紧凑,产生了强大的审美张力,但略有不足的是,章节标题的设置给人过于刻意的感觉。

对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只谈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两点。第一点主要是围绕丫丫这一独特的人物形象。丫丫出生于半个世纪前中国的大饥荒岁月,父母都因贫病而去世,成为孤儿,饱经物质匮乏的磨难,但正因命运悲惨,她又受到哥哥和邻里乡亲的宠爱,“以刮骨剔肉的方式”维持了她的生命,并让她进入了越剧学校,最终成名。但成名之后,丫丫却不愿回老家演出,好不容易回去了,最终还是罢演。而且在成名的过程中,她与青梅竹马的恋人分手,与相依为命的哥哥反目,与恩人老师变成对头,

把同窗姐妹当作仇敌。其所作所为已不止是忘恩负义,其心灵已扭曲到令人发指,随着事件的发展,邻里乡亲终于无法容忍这个他们原本引以为傲的明星,发出了“打死她,打死她”的呐喊,而丫丫则在邻里乡亲的呐喊声中,狼狈逃离。那么,一个在哥哥、邻居和乡里乡亲的淳朴关爱中长大的漂亮可爱的女孩,缘何会转变为一个如此让人深恶痛绝而众叛亲离的形象呢?这正是小说希望引起读者关注的问题。

丫丫的出格表现,一方面当然与她的性格有关,因为她自幼受到宠爱,出于同情和喜爱,人们把能省下来的一点好东西都让给了她,习惯之后她就视之为当然了,于是逐渐刁蛮成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物质极度匮乏的创伤记忆。两相结合就使她产生了对物质利益异乎寻常的渴望。正如小说中所说的,“这种怀抱希望而又绝望的生活,苦苦地折磨着她”。而商品社会利益至上的环境,进一步刺激了她对物质条件的强烈追求。小说通过一系列的情节,反复刻画她一旦面对利益,就六亲不认的扭曲性格。比如,对于大腕歌星,“丫丫感到极大的反差和失落,对他们,在轻蔑的同时羡慕得眼睛发绿,连做梦都想当大腕歌星”。她的极度敏感、自尊、固执、嫉妒、仇恨,可以说都是根源于此。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丫丫这一人物,作者不但表现了自己“对人生道路和价值的思考”,同时还挖掘出了丫丫所代表的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源。

另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小说对前山、后山两村群众有关面子问题的描述,因为其中包含着作者对中国农村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小说中指出,“这里的人剽悍豪爽,把面子看

得比生命还重”。这两个本来同宗的村庄,经常会因芝麻大的小事进行械斗,直到一方流血死人为止。小说对两村之间为了丫丫先到前山还是后山演出的面子问题,以及为此进行的挖空心思的权谋和无休止的争斗,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实际上,面子和尊严是两个有着根本区别的概念。中国人有句俗语,叫作“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尊严是树,面子是皮,但中国人往往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轻重倒置,不去注重、追寻生命本体的质量,而是注重表面的皮,并不惜为之付出树的代价。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实际上和中国人历来强调的“舍生取义”有着逻辑上的传承关系,因为“义”说大了可以是民族国家的大义,小了就可以只是面子。所以,这部小说在对因面子问题而引起的争斗做出细致描述的同时,也对中国人深信不疑的传统价值观进行了反思。

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动因,作者在自序中说,是基于其难忘的那段农村生活:“我曾身处类似书中事件的中心,亲历了惊心动魄的场面,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和无奈……当时就有写它的冲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像某些民粹主义作家那样,刻意要把农村描写成为一个纯净的乌托邦之乡,而是完全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在描写其淳朴、善良的同时,更揭示了其藏污纳垢的真相,这实际上是对现代文学揭示“民族劣根性”传统的承继。但这部小说也有明显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叙事和语言方面。虽然作者说已经删掉了 5 万多字的“彩缎”,但仍然不够精练。比如,邻居省出一块红薯给丫丫,自己却饿肚子,这时,叙述人就不应该再站出来说,“在物质那么匮乏的年代,其实能省

出一块红薯,也是很不容易的”之类的话,但类似的议论,在小说中不为少数。另外,在描写上,如果能用白描,就少用形容词;其实情节上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情节已足够说明问题,就没必要再去增加。沙民对海明威的“冰山”原理,显然还缺乏更高、更自觉的领悟。不过,在这一点上,并非只有沙民如此,中国的大部分作家都是如此。

黄梅宝的《水色》写的是一个医院改制和复仇的故事,故事也是缘起于半个世纪前的那个疯狂年代。青山医院院长梅文元刚上任不久就面临改制,因资金不足,他想把医院发展壮大的理想陷入困境,此时白鹭集团愿意与其合作,但实际上它是前来复仇的。白鹭集团的董事长白凌实际上是梅文元的表亲,由于梅文元母亲李桂芝的迁怒,少时的白凌和自己的母亲及姐姐深受虐待与凌辱,结果亲人悲惨死去,白凌则在受尽逃亡流落之苦后,靠卖笑蓄财,创立白鹭集团,最终,她通过对青山医院的操控,对梅文元家人的凌辱,为自己复仇。

在《水色》中,白凌是一个气质优雅、能干的女老板,却又是一个被疯狂的仇恨所扭曲的,蛇一样阴冷、残酷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复仇几乎成为她唯一的目的,她的事业成功了,复仇成功了,但她的人生注定是个悲剧,因为她已无法恢复正常的人性,也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和丫丫一样,作者试图把白凌的疯狂归结为那个疯狂年代的创伤,而且她所受的伤害要比丫丫更重,但是,在具体人物的塑造和情节处理上,小说却有不少做得不够到位的地方。在小说中,虽然梅朵(白凌的母亲)和两个女儿的遭遇,与梅朵的父母遭受政治迫害有关,如果没有政治迫